

丝绸之路史地研究

陆庆夫 著



兰州大学出版社

兰州大学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本书共收入作者关于丝绸之路史地研究的论文 20 篇,内容分五部分。第一部分 4 篇,重点讨论汉唐各朝对丝绸之路特别是河西地区的开发经营;第二部分 3 篇,论述了古代通西域的交通道路及相关问题;第三部分 7 篇,探讨了自汉至宋活跃在丝绸之路的诸多民族及相互关系;第四部分 3 篇,考证了若干丝路重镇的地理位置;第五部分 3 篇,着重对十六国时期五凉地区的文化教育作了考察。本书内容丰富,史料翔实,观点允当,先曾在不同刊物上发表,产生过一定影响。

丝绸之路史地研究

陆庆夫 著

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兰州市天水路 308 号 电话:8617156 邮编:730000

兰州大学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排版

兰州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8.375

1999 年 6 月第 1 版 199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209 千字 印数:1—1000 册

ISBN7-311-01532-4/K·185 定价:15.00 元

序 言

1981年夏天,在我刚刚通过了题为《唐代前期对河陇地区的经营及其效果》的研究生毕业论文答辩后,一个由中国唐史学会部分会员发起组织的丝绸之路考察队正好在兰州成立,我有幸随齐陈骏老师加入了这一队伍。在将近两个月的时间里,我们从河西走廊到天山南北,从大斗拔谷到居延古塞,行程八千公里,造访近百个景点,饱览了汉魏隋唐的灿烂文化,领略了大西北雄浑神奇的风情。虽说是走马观花,目不暇接,但亦足以令人心撼神摇,印象至深。特别是与一批学术界的专家学者一路同行,聆听教诲,受益良多。

那次的考察活动很快就结束了,而酝酿在我心中的对丝绸之路的考察却从此开始了,这种考察不同于前者,不只是实地参观,而是通过大量文献资料对实地考察过的地方进行探讨,对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历史进行研究,对在这里出土的文书、文物进行考证。这种考察在时间上也不是一两个月,而是一二十年。在近二十年的时间里,由于教学、科研的需要,我有时也会参与其他课题。但与丝绸之路的情结,却一直未曾斩断,并且总是一有机会,便情不自禁地从事有关丝绸之路的思考与写作。

收入本书的20篇文章是我这些年发表论文的一部分。在写作时间上,有早有迟,最早的写于1981年,最迟的则写于1998年。在内容上,这些文章或论述历朝之经营,或讨论中西之交通,或考察民族之变迁,或辨析古城之地望,还有的涉及宗教、学术及选举,涵盖了政治、军事、经济、民族、宗教、地理、文化等方面。尽管这些文章选取的时代不同,研究的内容不同,立论的角度不同,但有一点

却是共同的，即都与丝绸之路有密切关系，可以说这是我近二十年坚持丝绸之路研究的一点微薄收获，因而定其名曰《丝绸之路史地研究》，并以此纪念 1981 年那次令人难忘的丝绸之路考察活动。

借编书之机，重读这些参差不齐的东西，觉得其中有不少需要改动之处，但一则这要投入较多的时间和精力，再则还想保持不同时期的历史原貌，也就只好一仍其旧了。如果说，这些篇章还有一点可取之处的话，那就是它们在实地考察与史书记载的结合上，在敦煌、吐鲁番文献与传世文献的结合上曾经做过某些尝试，在观点的创新和史料的认识上也下过一定功夫。当然，要提出新的见解，难免会与别人的意见相左，但这纯属学术问题，不掺杂任何其它因素。如有冒犯得罪之处，还望前贤时彦海涵，勿以我之唐突为怪。

陆庆夫

1998 年 12 月

目 录

序言.....	(1)
汉唐开发河西之比较.....	(1)
曹魏时期河西经济恢复原因浅析.....	(7)
略论隋朝对丝路的经营	(18)
唐代前期对河陇地区的经营及其效果	(31)
五凉政权与中西交通	(56)
论王玄策对中印交通的贡献	(71)
关于王玄策史迹研究的几点商榷	(90)
汉唐间中亚胡人来华原因浅探.....	(104)
略述五凉的民族分布及其融合途径.....	(110)
十六国时期五凉地区的人口迁徙.....	(123)
唐代丝绸之路上的昭武九姓.....	(134)
从敦煌写本判文看唐代长安的粟特聚落.....	(148)
论甘州回鹘与中原王朝的贡使关系.....	(156)
党项的崛起与对河西的争夺.....	(173)
锁阳城杂考.....	(189)

陈子昂的河西之行与唐代同城考辨·····	(196)
也谈《哥舒歌》中的临洮·····	(203)
五凉文化简论·····	(210)
吐鲁番出土西凉“秀才对策文”考略·····	(225)
五凉佛教及其东传·····	(243)

汉唐开发河西之比较

甘肃河西在古代曾经以其连结中西的地理位置，宜耕宜牧的自然条件，多民族杂居的政治因素，吸引着历代统治者对之开发经营。汉唐是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两个王朝，同时也是开发河西最有成效的王朝。总结这两个朝代开发河西的主要经验，比较其异同得失，对我们今天进一步开发河西不无借鉴作用。

一

汉代对河西的开发始于汉武帝元狩年间。在此以前，河西乃至西域一带为匈奴贵族所控制。匈奴贵族在西北地区的掠夺、侵扰，曾经给汉朝造成极大威胁。武帝即位时，汉朝国力经过几十年休养生息，已经有了很大恢复，遂决定对匈奴开展反击。战争于元朔二年（前127）、元狩二年（前121）和元狩四年（前119）进行了三次，汉朝大获全胜，收回了河南地及河西地，匈奴从此远遁。

为了巩固胜利果实，防止匈奴再来，汉武帝决定大力开发河西，“以断匈奴右臂”（《汉书·西域传》）。武帝开发河西的主要措施，其一是设郡移民，加强防守。对此，《汉书·地理志》写道：

自武威以西，本匈奴昆邪王、休屠王地，武帝时攘之，初置四郡，以通西域，隔绝南羌、匈奴。其民或以关东下贫，或

以报怨过当，或以悖逆亡道，家属徙焉。

武帝在赶走匈奴贵族后所设河西四郡分别为武威、酒泉、张掖、敦煌，下辖三十五县，委任官吏、驻扎军队、修长城、筑烽燧。同时，又大量从内地移民于此，除生活贫困、罪犯及家属等徙民外，据史书所记，还有相当数目的戍卒。郡县之设，将河西正式纳入汉朝版图；塞墙的修筑，阻挡了匈奴南下；大量徙民和戍卒又充实了边陲，在人力、物力上为“断匈奴右臂”的战略决策提供了保证。

其二是屯田灌溉，以供军粮。大批军队在边地征战戍守，粮食供应是一大问题。为此，汉武帝派遣数十万“戍田卒”、“斥塞卒”，一面戍边，一面垦种。随着郡县的设置及大批徙民的到来，大面积屯田在河西等地展开。《史记·平准书》载：“上郡、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田之。”西汉在河西屯田非常重视水利工程的兴修，《史记·河渠书》云：“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而居延汉简中也有甲渠、临渠、广渠等灌溉名称；此外，还有专事修渠引水的“河渠卒”。

由于大批徙民从内地带来了先进技术与耕作经验，政府又在这一带推广代田法及耒犁等农具，加之这里水土丰足、畜牧发达，故屯田收到了促进农业发展之功效。《汉书·地理志》称这里“谷余常贱”、“贤于内郡”。

其三是开通丝路，遏制匈奴。《汉书·西域传》讲：“列四郡，开玉门，通西域，以断匈奴右臂。”从中不难看出，设置四郡，布兵筑塞，徙民屯田，交通西域，这些都是汉武帝“断匈奴右臂”这一战略总决策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河西是丝绸之路的咽喉要道，不开发河西，便不能打通丝绸之路，也无从交通西域，故对河西的开发还包括对商路的开发。河西设郡驻军，保证了丝路咽喉的安全；而移民屯田则保障了丝路使节、商旅的供给，这些给开通丝路创造了必要条件。张骞初通西域，由于河西一带为匈奴

所占，辗转困阻十三年，同去一百多人，唯二人生还。元狩四年，丝路开通，张骞再通西域，同行三百多人，携带金、帛、货物及牛羊万头，分遣副使至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等国，取得了很大成就。这些国家从此与汉朝有了外交关系。其中乌孙王还亲派使者带上良马随汉使来到长安，与汉朝建立了极为友好的关系。也是在此后，丝绸之路“使者相望于道，诸使外国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汉率一岁中使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辈，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返”（《史记·大宛列传》）。这些频繁的往来，不仅加强了汉朝与西域各国的联系，更重要的是使匈奴遭到一系列失败，西域诸国中凡匈奴羁属者皆瓦解，最终造成了匈奴人的第二次西迁。同时，通西域还增进了中西之间的物质文化交流。双方通过贡赐方式贸迁有无，中国的丝绸源源不断地运往中亚、南亚、西亚甚至欧洲各地；而西域各国的良马、狮子、犀牛、苜蓿、胡桃、菠菜及乐曲等也因之传入中国。

二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又一个强大王朝，同样很重视对河西的开发。但唐代河西的形势已经与汉代有很大不同。首先，唐代的疆域已经发展到高昌以西，河西属唐朝内辖地区；其次，自从汉设四郡以来，经过汉魏晋隋各朝的经略，河西情况已经发生了较大变化；此外，唐代河西虽不再是匈奴人的天下，但仍有边患发生，尤其到了唐高宗以后，西部吃紧，吐蕃、突厥时时攻陷安西四镇，进犯河西。基于此，唐朝对河西的开发，仍然从军事角度出发，重点是加强战备，足食足兵。其主要做法是：第一，增兵设防。武则天称帝后，其谋臣陈子昂曾经奉命于垂拱二年（686年）巡察河西，并上疏极言河西形势险要，宜加强防守。他的建议引起朝廷

重视，此后不断在河西增兵。至唐玄宗时，又重新部署兵力，分设河西、陇右等节度使，并与朔方、河东节度使配合，使之互为犄角之势，加强对吐蕃、突厥的守备。唐玄宗很重视军队的训练，指出“虽万方和同，不可薄其武备；百蛮朝贡，不可轻其疆场”，下令“裹粮坐甲，秣马利兵，明教队伍，远为侦候”（《全唐文》卷29）。由于武则天、唐玄宗的锐志经营，河西防务善备，屡屡战败吐蕃、突厥。天宝八载，节度使哥舒翰攻下吐蕃盘踞地区石堡城；天宝十二载，他又收回黄河九曲故地。接连的胜利标志着战争双方力量的某些变化，也一度遏制了吐蕃贵族的扩张野心。正如当地一首歌谣所唱的：“至今窥牧马，不敢过临洮。”

第二，屯田储粮。唐朝在河西增兵设防，相应地必须保证军粮供给。如何保证军粮？史书云：“军州边防镇守，转运不给，则设屯田，以益军储”（《唐六典》卷7）。这是自汉以来历朝都沿循的一种做法。唐朝在河西等地的屯田，以武则天、唐玄宗二朝最见成效。陈子昂巡视河西时，曾指出甘州水源充足，屯田四十余屯，如果增加人力、挖掘地利，岁收可达三十万石。河西按此办理，数年之后，养兵百万，食无不足（《陈子昂集》卷8）。后郭元振任凉州都督，命甘州刺史李汉通“开置屯田，尽水陆之利”，数岁丰收，“积军粮支数十年”（《旧唐书·郭元振传》）。甘州以外，唐朝在凉、肃、瓜、沙各州驻军也都实行屯种。河西屯田促进了农业发展，加之这里地广人稀，遂致粮食丰余。故官府在屯田同时，还采取“和籴”办法，即官方出钱，百姓出谷，来征集民间多余的粮食，每年仅在河西“和籴”的开支即达八十万段绢，可证河西粮食之多。唐玄宗时，河西节度使牛仙客因经营河西有方，善于积粮，“仓库盈满”、“所积巨万”（《旧唐书·牛仙客传》），还被破格提拔当了宰相。

第三，屯牧养马。唐朝，曾在陇右开辟广大监牧，大量养马，马最盛时，达七十多万匹。河西原为游牧部族居住的地方，水草

宜畜牧。《汉书·地理志》称：“凉州畜牧为天下饶。”唐代很注意利用这一有利环境，在陇右养马的基础上，又于河西置八马坊，养马三十万匹，使这里的畜牧业得到进一步发展。河西的粮食、马匹有力地支持了唐朝向西域的开拓。

第四，丝路贸易。自汉武帝开通丝路后，历代统治者经营或有不善，丝路时断时通。唐代国威远播西域，丝路重又通畅。加上河西经营有方，物资基础比较丰厚，丝路呈现空前繁荣之貌。史称“兴胡之旅，岁月相继”（《旧唐书·崔融传》）。蒲昌海一带有“石城镇”，玉门关附近有“兴胡泊”，敦煌十三乡中有“从化乡”，其实都是到河西经商的西域胡人驻足之地。当时沙州、凉州是国际贸易市场，瓜州则是内地运来丝绸的中转站。据敦煌遗书反映，敦煌设有供胡汉商人经商的市，市设市令，市里有行、行客、行头等，说明其组织、分工相当复杂。从成交的货物看，有丝绸、褐布、漆盒、钢刀、箭筒、马、驼、羊、驴、珍珠、染料、麝香、干果，乃至奴婢等。丝路贸易的繁荣无疑增加了官府的收入。

三

由上述不难看出，汉唐两朝开发河西尽管前后相距八百多年，但在做法上却有不少相似之处，如都是从军事角度出发开发河西；其具体措施如设郡驻防、屯田积谷以及开通丝路等等，也都大体相同。然而毕竟时代变了，情势各异，如果细细分析，两王朝对河西的开发，又颇有不同之处。一是开发的侧重点不同。汉代开发河西，主要是基于匈奴的威胁，故其在河西设郡、驻军、徙民、屯田、筑长城、开丝路、通西域，无一不是围绕解除匈奴之患这一中心。其侧重点显然在政治。唐代西域远达四镇，尽管吐蕃、突厥也曾觊觎河西，但唐在此地增兵设防，却是以足食足兵，加强

备战为宗旨，故其侧重点在经济。唐朝在河西长期屯田、屯牧、通商，终于使这里由原先“州县萧条，户口鲜少”（《旧唐书·李大亮传》）的状态，一变而为桑麻遍野、阡陌相望的繁荣之貌，故史书云：“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资治通鉴》卷216，此陇右包括河西。）

二是开发的程度规模不同。西汉开发河西，是初创，刚刚打开了局面，有的方面（如商业贸易），并未充分开展；有的方面（如牧业），似乎还没有涉及。唐代是在以前各朝开发河西的基础上的进一步深化，故其规模更大、程度益高。善从战备出发，而于经济入手，由屯田、和籴而推动农业；由屯牧养马而促进畜牧业；由开通丝路而发展商业贸易，从而全面推开，使河西地区的经济较快得到发展。

三是开发的方式方法不同。正因为汉朝开发河西是初创，故其缺乏经验，方式方法自然也就欠缺，显得单一化。如汉代在河西屯田以供军需；唐代不仅屯田，还通过和籴等方式广积粮食，又如汉武帝爱马，为此不惜派使臣、出重兵、万里征求；得马后夸示国中，靡费长安。唐朝养马，尽管亦从国外引进优良品种，但更注意利用陇右、河西等空旷之地，设置牧监，使其大量繁殖。在丝路贸易方面，汉代经常采用的一种方式是通过朝贡与回赐，来达到贸迁有无的目的；唐代尽管也采用这一方式，但同时还通过在边地与周邻部族互市来开发贸易。此外，也鼓励商人以个人身份与胡人通商。而政府则通过对商人征税增加收入，并用之进一步经营丝绸之路。史载：“开元盛时，税西域商胡，以供四镇”（《新唐书·西域传》）。凡此种种，都说明唐朝开发河西，方式灵活，方法多样，比较西汉，要搞得更活一些。

总而言之，通过对汉唐两朝开发河西的比较，我们认为，历代统治者很重视开发河西，西汉是其发轫，唐代是其高峰；前者为后世的开发打下了基础，后者则是前者的继续与发展。

曹魏时期河西经济恢复原因浅析

古代历史上的河西，原是少数民族杂聚的地方。汉初，匈奴人游牧于此，控制了河西和西域，中断了中西交通，并对中原王朝造成威胁。汉武帝为了斩断匈奴右臂，曾派霍去病出击匈奴并获得了胜利，在这里设立酒泉、张掖、敦煌、武威四郡，汉昭帝时又增设金城郡，谓之“河西五郡”。自是移民屯田，开通西域，不断经营，直至东汉，河西一直是一个安定富庶的地方。即使在王莽篡权时，“天下扰乱，唯河西独安，而姑臧称为富邑，通货羌胡，市日四合。”^{〔1〕}

东汉末年，由于马腾、韩遂等军阀混战，使河西的经济遭到了极大破坏，人民死亡流徙，户口大量减耗，以金城郡为例，在东汉繁盛时，领三千八百余户，^{〔2〕}东汉末，被韩遂等“所见屠剥，死丧流亡，或窜戎狄，或陷寇乱”，竟至于“户不满五百”了。^{〔3〕}

随着曹魏政权的建立，河西这块曾经繁荣一时的地方重新被纳入中原王朝的经营范围，史载：“魏文帝即位，分河西为凉州”，“其刺史领戍已校尉，护西域”。^{〔4〕}由于曹魏政权的重视，河西经济很快就得到了恢复。在农业上，据《晋书·食货志》记载，旧时凉州“土地少雨，常苦乏谷”，魏明帝世，由于“广开水田，募贫民佃之”，居然出现了所谓“家家丰足，仓库盈溢”的局面。农业的发展，也促进着商业的繁荣，土地上的收获除了供给军队开支以外，还用来与西域各国发展贸易，致使“西域人入贡，财货流通”。随着商业复苏，中西关系的日益加强，丝绸之路为之空前畅

通，故《魏略·西戎传》云：“从敦煌玉门关入西域，前有二道，今有三道”。^{〔5〕}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引起了人口的回流和增殖，金城郡在汉末丧乱之后，人户大量流散，曹魏政权建立后，因招怀流亡，治理有方，遂使“旬月之间，流民皆归”，居民“见户千余”，羌胡部落归就郡者达到三千余落。

—

曹魏时期河西经济能够如此迅速的恢复和发展，其原因，首先在于推行了“任人唯贤”的用人政策，对地方吏治比较重视。

这可以从《三国志》所记曹魏时期河西官吏的治绩上得到证明。

《三国志》所记凉州刺史主要有两人：一个是魏文帝黄初年间（公元220～226年）的张既，另一个是魏明帝太和年间（公元227～233年）的徐邈。张既出身寒门，能写一手好文章，颇为曹操赏识。曹操任司空时，曾召他作官，他没有到任。以后又被举为茂才，当了新丰县令。史称张既精于吏道，“治为三辅第一”，在朝中很有威信。黄初二年，在地方割据势力的招诱下，“凉州卢水胡伊建妓妾、治元多等反，河西大扰”。新上任的凉州刺史邹岐无力收拾这个局面。魏文帝经过比较，以张既“谋略过人”，“非既莫能安凉州”，就派他为凉州刺史。张既到凉州后，很快就平息了骚乱。他任凉州刺史多年，不仅以“政惠著闻”，还给酒泉、敦煌等郡物色了有才干的官员。魏文帝高度评价他在西陲的业绩，称为“国之良臣”^{〔7〕}。在张既以后的徐邈，也是曹操时就出名的人物。《三国志·魏书·徐邈传》云：“太祖平河朔，召为丞相军谋掾，试守奉高令，入为东曹议令史，魏国初建，为尚书郎”，后又历任陇西、南安太守，颍川典农中郎将，“所在著称”。魏明帝时，“以凉

州绝远，南接蜀寇”，极不放心，特挑选徐邈充任凉州刺史，持节领护羌校尉。徐邈在官期间，发展生产，推行教化，致使“百姓归心”，“荒戎入贡”。徐邈官至光禄大夫，死后朝廷追思清节之士，称赞他“忠清在公，忧国忘私”。

《三国志》中著名的河西地方官员尚有金城太守苏则，敦煌太守仓慈。苏则历任酒泉、安宁、武都太守，经略边陲多年，“所在有威名”，受到了曹操的赏识。黄初元年，出任金城太守，“则到官，内抚凋残，外鸠离散，既有恤民之效，又能和戎狄”。魏文帝嘉许他的治绩，官加护羌校尉，赐爵关内侯，还以他的事迹为榜样，“劝忠臣，励风俗”，加强吏治。^{〔8〕}仓慈太和中迁敦煌太守，在官多施惠政，数年死于官任。消息传出，“吏民悲感如丧亲戚”。尤其西域胡人，闻讯“悉共会聚于戊己校尉及长吏（史）治下发哀，或有以刀画面，以明血诚，又为立祠，遥共祠之。”^{〔9〕}仓慈在胡汉百姓中有如此高的威信，足以证明其为官之清廉，政绩之卓著。

此外，还有一些河西官吏，在《三国志》中虽未单独立传，但在他人的传中偶有涉及，也都语多肯定。如汝南孟建“为凉州刺史，有治名”。^{〔10〕}武威太守毋丘兴在官“内抚吏民，外怀羌胡，卒使柔附，为官效用”。^{〔11〕}敦煌太守皇甫隆“勤恪爱惠，为下兴利”。^{〔12〕}金城太守张就与其子张恭同在西陲为官，“父子著称于西州。”^{〔13〕}等等。

以上这些记载，出于封建史家笔下，尽管不无溢美之词，但是，我们仍旧可以看出，曹魏政权对远在西陲边地的河西是很重视的，所派官吏也都经过慎重挑选；其次，就河西地方的吏治看，是上轨道的，各刺史、郡守在官兴利除弊，皆有一定的作为。这些都是曹魏的用人唯贤路线在河西的具体反映，也是河西经济迅速恢复的原因之一。

二

曹魏时期河西经济迅速恢复的原因，还在于对羌胡少数民族实行安抚政策，较为妥善地处理了一系列民族问题。

河西地处偏鄙，连接西域，羌胡等少数民族杂聚于此，存在各类矛盾。当时人就曾指出，这里“民夷杂居，数有兵变”，^[14]这些所谓“兵变”，正是各种矛盾的爆发。如东汉末年，金城一带胡汉百姓造反，他们劫豪族地主韩遂、边章为首领，“杀刺史、郡守以叛，众十余万，天下骚动。”在曹魏政权建立以后，这种“兵变”仍不断发生。如黄初元年，即有西平人麴演勾结张掖、酒泉等郡的地方割据势力挑动羌胡部族进行分裂活动。史载，黄初元年，“西平郡麴演结旁郡作乱……武威三种胡复叛。”黄初二年，“凉州卢水胡治元多反，河西大扰”。其后西平麴光又反，“杀其郡守”。^[16]

统观这些“兵变”，有的是不堪忍受封建统治阶级的剥削和民族压迫而起而造反，如东汉末年朝政腐败，官吏贪苛，金城人民揭竿而起。但是后来这支起义军被地主阶级野心家韩遂所控制，韩遂杀害农民起义军领袖义从胡人北宫伯玉等，使十多万部众变成一股割据势力；还有的“兵变”则直接为割据一方的豪酋所裹胁，如曹魏建国初期，麴演伙同张进于河西作乱，“时雍、凉诸豪皆驱略羌胡以从进等”。^[17]另外，蜀国为了向西扩展，实现诸葛亮“西和诸戎”的战略决策，企图通过羌族名将姜维，“诱诸羌胡以为羽翼”，^[18]以西取秦州、凉州。如正始八年（公元247年），“陇西、南安、金城、西平诸羌俄何、烧戈、伐同、蛾遮塞等相结叛乱，攻围城邑，南招蜀兵，凉州名胡治无戴多叛应之。”^[19]上述这些“兵变”的参加者，大多数是羌胡少数民族，他们参加“兵变”，既有